
第一部分

总论

一 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

(一) 中国近代史上限 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八四〇年上限说】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观点已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什么以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呢？刘大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统治形成及其开始没落、消灭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起端的。”^{①*}

【明代中叶上限说】 尚钺持此说。尚钺这一观点是在五十年代讨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来的。他认为：“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将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看法”，“而且也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问题。因为，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譬如，以太平天国这一个近代史上伟大农民革命战争来说，就其性质说，已经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如天朝田亩制度，平等和平均观念的发挥，以及政治和

* 注均见本部分文末，其它各部分同。

军事组织及其内容，如果不与明清之际的市民斗争及其参加农民斗争的现象联系起来，特别是不把它作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来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政策的一个发展来看，就无法解决。同时，如果不把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理想，作为从明末清初经济思想上的均田、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思想上的平等平均的观念（由地主与农民平等，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儒释道封建宗教的束缚）等等反封建特权及反封建大地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的继续和发展、并将它在人民大众的革命纲领和实践行动中具体化，也是无法理解的。”作者同时又指出：“自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是解体过程中的封建社会，不再是什么自然经济体系的‘完整的封建社会’或‘原封未动的封建社会’。就是说，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逐渐变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封建制度已经愈益成为要被推翻的东西了。它虽然表面上还很强大，但是却是衰竭的、死亡着的东西。”^②

（二）中国近代史下限 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按照传统的说法，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五十年代，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有人主张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止。这一主张，为不少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尽管如此，目前仍有两种不同主张。

【一九四九年下限说】 持此说者有林敦奎、陈旭麓等。

林敦奎是五十年代提出此说的代表。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延长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理由是：

“因为一八四〇——一九四九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让位于中国无产阶级，因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成截然不同的

两个革命阶段——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和性质在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他认为：“一八四〇年以后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近代史的范畴。”^③

陈旭麓认为：“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它不应是标示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示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据此，他认为：

“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就不应是五四运动，而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体地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它的社会生产关系始终是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关系，这种过渡关系的主要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封建生产的搏斗，爱国的人民和外来侵略势力的搏斗。长期搏斗的结果，虽然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但社会生产一直是在曲折的途程上变化和发展的。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些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④

刘大年、李新、李侃、荣孟源等亦持此说。

【一九一九年下限说】 论述此说者以王廷科最为全面。他根据列宁关于区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论断，认为：“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史。”他以一九一九年为中国近代史下限的具体理由有五：一、以

社会形态而论，“五四运动以后，尽管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这时的中国，出现了两种政治、两种经济和两种文化的长期存在。这种局面，是五四运动以前所不曾有过，也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这种复杂的特殊的社会情况与五四运动以前的社会情况，是显然不同的”；二、从时代中心变化看，“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不是别的，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这时，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已经代替了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因此，中国历史也就由‘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三、从革命的特点来看，“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我国五四运动以前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决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等量齐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相同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也有不同点。”不同点包括“领导权的不同”、“革命的指导思想的不同”、“革命目标和革命前途的不同”、“革命阵线的不同”，“而不同则是更为重要的。特别是由于革命领导权的转移，由于革命所属的阵线不同，决定了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属于同一的历史范畴，而是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因此，不能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加区别地一并划入中国近代史范围”；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来看，“没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虽然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联系又有区别，但联系是主要的。”两种革命，“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都是‘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这两大革命同

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范畴，在中国理所当然地同属于中国现代史历史的范畴。因此，应当如实地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地位来看，“如果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并列起来，一起划入中国近代史范畴，那么在客观上就贬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地位。如果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分割开来，分别划入不同的时代——近代和现代，也就不能完整地准确地反映中国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全部历史。”^⑤

二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分期

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涉及基本线索和分期的标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分期等问题。

（一）基本线索和分期的标准 以什么东西作为描述基本线索和分期的标准呢？主要有五种不同说法。

【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标志】 持此说者以胡绳、戴逸为代表。

胡绳指出：“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我们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其理由是：“中国近代史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从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不仅是说，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生活中的一个恶毒的因素，而且表示中国社会内部渐渐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引起了中国社会力量的重新配备，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和外国帝

国主义侵略势力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出现了激烈的和复杂的阶级斗争（反帝国主义斗争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因此，“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发展的。”^⑥

戴逸也主张“用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其理由有四：“第一，阶级斗争最本质地反映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反映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第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第三，阶级斗争反映了作为历史主人翁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第四，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现象和阶级斗争相关连，发生在政治、法律、思想、艺术各个领域内的斗争，其背后都站着一定的阶级”。“由此可见：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最能够体现生产方式的变化，最能够揭露历史前进运动的规律，最能够显示人民群众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最能够反映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⑦

王仁忱、祁龙威等亦持此说。

【以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 持此说者以金冲及为代表。他认为：近代史分期的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以找出中国近代历史过程发展各个阶段的具体特点”。其理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相互关系（相互适应或相互矛盾），决定着政治生活、社会意识等相应的变化。因此，解决历史分期的标准，首先必须从生产方式中、社会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去考察”；“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阶段，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变革最深刻的反映，也是当时整个社会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情况最显明的标志。因此，决定历史分期的标准，同时也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表现中去考察。”^⑧

【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 持此说者以范文澜为代表。范文澜主张“用主要矛盾来划分历史阶段”。他根据《矛盾论》，认为中国近代史“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中国近代史发展进程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两种主要矛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两种主要矛盾中的一种，互相替代起着领导和决定的作用，成为某一特定时期里的主要矛盾”。^⑨

【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尤其是某些性质变化为标准】

持此说者以孙守任为代表。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有两个特征：一是“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特殊过渡性的社会，既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更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过渡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中国近代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也不是完全殖民地的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从第一个特征看，“考察这个社会历史分期的，就不能不特别注意到这个社会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阶级斗争性质上的某些变化，而不能只拿阶级斗争的高潮和低潮做标准来考察”；从第二个特征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就不能不特别注意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上的某些变化”。作者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史分期就不能不从这个矛盾而又统一着的过程的发展上去考察，尤其着重过程的某些性质的变化。”^⑩

【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为依据】 持此说者以戚

其章为代表。他认为：“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究竟应该以何为依据呢？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依据，不能说不，但未免失之笼统，事实上是很难具体掌握的。”作者主张：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依据“应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提出这一标准的理由是：“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是，对于这两个敌人，又不可等同对待。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帝国主义变成中国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柱，于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便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诸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而推翻帝国主义也就成为革命的最主要任务”，而“在中国近代史的前期，革命的前途就是发展资本主义”。^⑩

（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 究竟怎样描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史学界众说纷纭，主要有八种不同说法。

【三次革命高潮说】 持此说者以胡绳为代表。胡绳最早主张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这段历史用“三次革命高潮”作为基本线索。他认为：“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针对有的作者认为“义和团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的说法，胡绳指出：“在充分估计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

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胡绳“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⑭

谢本书、祁龙威等人赞同“三次革命高潮说”。谢本书较详尽地简述了赞同此说的理由。他的理由有五：一，“一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线”。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因此，“胡绳同志归纳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二，“如何评价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成了探索中国历史发展主线的前提”。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它理应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的起点（鸦片战争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的序幕）”；而“洋务运动不仅不应该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的起点，而且其进步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说到底，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其反动性大大超过了它的进步性”；三，“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应当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的中间环节”。他认为：“只有把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性的戊戌变法与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义和团运动合在一起，作为近代中国第二次革命高潮的标志才更符合历史的实际。这样，把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的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就是合乎逻辑的”；四，“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的突出表现”。他认为：“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使它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历史发展主线的更加突出的表现”；五，“三次革命高潮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

为：“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虽然各个阶段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不管是清朝政府中的爱国人士、进步思想家或者农民领袖、资产阶级各派的领袖，他们只要进行了或参与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⑬

【四个阶梯说】 持此说者以李时岳、张耀美为代表。

李时岳“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并“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按照一般规律，封建社会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前景）。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对封建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进步”。“反映半资本主义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突出的标志则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要以这“四个阶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呢？作者进一步分析说：“因为中国本来没有资本主义，所以中国近代史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任务最初只能由农民来承担。通过太平天国对清朝统治的沉重打击以及对最腐朽的权贵势力的扫荡，才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提供了逐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西方移植的，所以在开始阶段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借法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而在封建主义密闭的殿堂中为资本主义打开缺口。随后，

有了资本主义，于是发生了资产阶级为扫除封建主义道路的斗争——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因此，反映中国半资本主义化趋向的线索及其标志，既不能忽视农民战争的作用，也不是纯经济性的现象，更不应和阶级斗争相背离。它正是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经济和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这就是‘四个阶梯’论的基本思想。”

持此说者反对“三次革命高潮”说，认为：一，中国近代史上并无三次革命高潮，“以义和团战争为中心的所谓第二次革命高潮”，实际上是一次“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形态内的阶级斗争有着各种不同的性质，因此，阶级斗争在性质上的发展变化似乎应比革命形势的涨落更能表明历史的发展趋势”；三，革命（武装斗争）不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标志，“代表新经济的新阶级的成长需要一个曲折的漫长的过程，在其力量严重不足时是不可能发动革命的，就有必要考虑用革命之外的阶级斗争的其他表现乃至某种折光为补充，才能把历史发展串连起来”。^⑭

张耀美主张“以反映社会经济矛盾的国内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而“反映这一线索的主要标志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其主要理由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这一发展方向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显示着这一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改革、革新、革命，这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从低级向高级的斗争发展过程。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革新、革命，是近代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当然，它不是近代阶级斗争的唯一形式。除上述基于社会经济矛盾而引起的社会内在的运动——国内的阶级斗争（包括太平天国运动）

之外，尚有另外的两种斗争形式。”国内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两种斗争形式”，是指“由清朝政府领导的民族战争，即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和“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如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这两种斗争“只是一种偶然性的因素，对社会经济过程不可能占有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当一个民族尚未被外族吞并的情况下，它的社会发展仍遵循‘其内部发展的自然历程’，并不改变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只是历史过程的内在运动采取特殊形式，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发展。”作者对史学界争论较大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分析，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确有所进步，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彻底反动落后的时期”。它是“过渡期的中间环节”，衔接了“前进发展的历史链条”。^⑮

【三个连续递进的历史阶段说】 戚其章是此说的代表。他认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连续递进的历史阶段，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根据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认为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依据有两条：“第一条，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里之所以只提反对帝国主义，乃是为了抓住问题的关键，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反对封建主义，因为二者是互相关联的。第二条，是发展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会看不清近代中国发展的总趋势，对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将无法切实地了解。当然，这两条依据要结合起来看，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作者认为：“三次革命高潮说虽然不无道理，却未必精当，因为它不能完全扣紧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以说明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道路和前途”。对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他也认为“有相当道理，因为它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

发生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由改良而革命，表达比较清楚”，但是，它“并不能概括全部中国近代史，所以也是有缺陷的”。^⑪

【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说】 持此说者以胡滨为代表。他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作者同时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在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都曾进行过学习西方的尝试和努力，这些尝试和努力统统失败了，但都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时，必须把向西方学习的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作者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认为：义和团“是一次对外民族战争，而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是一个反帝爱国运动。它在性质上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是相同的，尽管它们本身各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义和团不能列入‘革命高潮’之内，中国近代史上不存在所谓‘三次革命高潮’，这是显而易见的”。^⑫

【反帝反封建过程说】 持此说者以苏双碧、孔令仁为代表。

苏双碧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是制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社会性质的。那时，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间包括封建王朝中的一些爱国志士、农民领袖、进步的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并努力寻找救国救

民的药方，这个过程就构成了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这当中，也包括在经济的反掠夺、剥削，以及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内容。”据此，作者认为：“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戊戌维新时资产阶级的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的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五四’运动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前八十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标志。”^⑮

孔令仁认为：“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主要有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种是农民的革命运动，另一种是资产阶级的革新、改良和革命运动。前者主要体现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后者主要体现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由于“在那时农民和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都是革命的阶级，他们发动的斗争都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所以都应算作历史的主流。不过，在1900年以前对历史进程起左右作用的是农民革命运动，这以后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⑯

【两个过程说】 持此说者以范文澜、荣孟源、张海鹏为代表。

范文澜认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一步深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步提高一步地进行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线索。”^⑰

荣孟源认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是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两个过程。”他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建立，一百一十年间，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变化，都和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这两个过程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而又相互影响。例如开办近代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简单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使中国变为殖民地或使中国获得民族独立的问题。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近代企业，攫取了中国的主权，这种‘发展资本主义’，是使中国沦为殖民地。洋务派开设近代工业，一是以制造镇压农民的洋枪为中心，一是用此以借外债，出卖主权，一是实行垄断，禁止中国人民开设同样的企业；这种‘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制难以抬头的。因此，不能抽象的谈‘发展资本主义’，必须在两个过程中来谈这个问题和其他经济问题。”对于向西方学习问题，作者也认为要“按照两个过程来分析，在一切文化教育等等问题上，也都要按照两个过程分析”。^⑩

张海鹏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过程”，“勾划出了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是“对中国近代基本进程的原则论述”，“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也是完整的概括”。他说：“既然是概括，就只能指出近代中国社会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本质的特点和过程，不可能对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巨细靡遗，兼收并蓄。”因此，“我们在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只能以它为指导，不能用它来代替或者包括中国近代史丰富多彩的内容。”“但是应当承认，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作者不同意“近代中国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的说法，认为：“在中国，不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不推倒封建主义的统治，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要发展是极其困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能